隐 :当代社会价值建构的传统维度*

胡翼鹏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武汉 430072)

摘要 :当前社会价值过分强调竞争、成功、进取、致富等取向 ,而缺乏必要的缓冲中和维度 ,这是造成当前社会结构性紧张的价值观根源 ,因而当代社会价值建构必须对极化的价值取向祛魅。来自传统社会思想的“隐” ,是当代社会价值建构不可或缺的必要内容。“隐”的核心内涵是欲望诉求的收敛与离弃 ,是面对“利”而行己有耻、廉让不争。知耻、不争等价值修持 ,对于当代社会极化看待“利”和过分强调“争”等价值取向 ,具有救弊补偏的积极意义 ,能够有效矫正社会成员在争取利益过程中的偏执与盲目 ,从而促成当代社会价值系统的辩证平衡 ,促进当前社会结构性紧张的化解。

关键词 隐 价值建构 当代中国 传统社会思想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0730(2011)10- 0094- 07

传统社会思想是当代社会价值建构的重要资源 ,不少研究者开始探索将一些传统文化元素改造转换为当代社会价值体系的有机构成。特别是自中央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之后 ,传统文化中的和、和谐等理念被学者们深入发掘出来 ,以期克服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某些不良因素提供来自先贤的经验智慧和精神动力。不过 ,若要有效实现“和”的终极目标 ,必须有与其相配套的价值维度。这一价值维度即是来自传统文化的“隐”。无论是从当下结构性紧张的社会现实来说 ,还是从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而言 ,“隐”都应当是当代社会价值建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当下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发展大约 15

年。^[1]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 ,造成中国当前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困境——结构性紧张。在社会学领域 ,一般将默顿于 1938 年发表的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一文视为关于“结构性紧张”的奠基研究 ,默顿在这篇文章中的相关论述被总结概括为“结构性紧张”理论。所谓的结构性紧张 ,是指社会文化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 ,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失衡状态。如某一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文化价值强调金钱、致富的极端重要性 ,而此时社会所能提供给人们的挣钱手段又不多 ,这时社会就处于结构性紧张的状态。^[2]

当前 ,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紧张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析。一方面 ,这种紧张是结构性的。由于物价上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压力与负担 ,造成社会成员普遍的心理焦虑与精神紧张。紧张和焦虑不是某个人的单个表现 ,而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日常行动 ,并且这

种紧张不是发生于某一局部领域,而是波及各个领域,具有通同共生、连锁反应的特点。另一方面,这是一种结构的紧张。表现为因社会结构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造成结构要素之间脱节,使不同利益群体由于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产生不满,因而引发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彼此关系紧张,潜伏着可能的冲突危机。^[1]

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与普遍笼罩社会成员的紧张和焦虑,二者密切相关。尤其是利益受损群体、社会下层因生存压力而产生焦虑与紧张,自然而然会以既得利益群体或疑似获益群体作为不满情绪的渲泄对象,而获益群体相对于社会下层、利益受损群体,本身具有经济与心理上的优势,由此也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关系。所以,紧张的结构化态势与结构内部的紧张格局是同一硬币的两个不同面向,彼此联系密切,相互影响。不论是紧张的结构性态势,还是结构内部的紧张格局,抑或是二者之间的联系纽带,其核心因素都是“利”:个体的获益状况,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滞后而导致的结构性紧张,其根源是社会成员的利益获得多寡、利益分配关系不平衡,从根本来说就是“利”,即利益、利害。

因“利”而引发社会普遍的焦虑、紧张和压力,本质上在于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在争取最大限度地获利,包括实物的利益、抽象的利益,个体的利益、集体的利益,等等。然而,“利”是一种稀缺资源:一方面不易产出,既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投入,也要受自然、社会客观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不能大面积同时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必然是某些人多得多占而另一部分人少得少占。因此,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人们必须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激烈竞争,一些宵小之徒甚至不择手段而专走旁门左道。俗语云,无利不起早。当前无论是升斗小民蝇营狗苟,还是官吏贪赃枉法、商人制假售劣、学者抄袭剽窃等种种怪状,亦都是因“利”而“争”。社

会结构性紧张造成的矛盾和冲突,归根结蒂无不与利益及争取利益有关,不是存在直接的利益诉求,就是包含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

《管子·侈靡》曰:“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是处。”人性好利,上下奔波、唯利所趋是人的本能。当代社会的逐利现象固然是人之本性使然,但更重要的是主流文化与政策的价值导向,进一步刺激了人的逐利本性,甚而使一些利令智昏的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不言而喻的合理化价值取向是竞争、致富、进取、成功等。当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极为正确的政治抉择,追求成功、致富亦是当代社会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过度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忽略社会文化建设,不良后果就是社会的结构性紧张,过分张扬成功和致富而忽视伦理道德建设,不良后果就是社会成员价值取向的偏颇。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在生活化价值层面,甚至包括知识化、制度化价值层面,成功主要指金钱上的成功,成绩也是指经济上的成绩。例如一些政府官员热衷于招商引资、工程建设,倾心于放大所辖地区 GDP 量值,其政绩观的内在取向实质上乃是以经济为衡量标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走向极致就是“一切向钱看”。“向钱看”是多年来最受诟病的不良风气,时至今日却很难说有多大改观,甚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亟需对竞争、成功、进取、致富等流行的价值取向进行适度降温,使之回归正常的理性状态。

目前,从政府到学界,都非常重视价值体系的建构工作。政府管理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引导建设良好社会风尚,而学术界人士亦予以积极配合,深入探索当代新型价值体系的有益元素和建构路径。不过,无论是政府部门的宣传倡导,还是学者们的探索发掘,似乎并未对在当代社会思想中已经被极化的竞争、成功、进取、致富等价值取向有所矫正或调适。存在决定意识,而思想支配行动。若要化解当前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使社会处于均衡状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支配社会行动的价

值观念必须是一个均衡体系。而进取、成功、竞争、致富等维度是“动”的单向路径,需要“静”的平衡向度才能使价值体系达成均衡互补。能够与进取、成功、竞争、致富等维度组合构成均衡体系的价值取向,就是来自传统社会思想的“隐”。

二

对于“隐”需要澄清两种误解:一是拘泥于“隐”的字面意义,认为隐士就是销声匿迹、脱离社会的人士;一是对“隐”的内涵作极化理解,认为“隐”就是无原则地妥协退让、自我放逐,隐士的人生是消极失败的人生。^[4]实际上,从中国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来看,“隐”并不是行迹藏匿而是心灵放逸、超越世俗。《庄子·缮性》说,“隐”并非伏身弗见、闭言不出、藏知不发,而是“其德隐矣”,即隐士的德性处于收敛静默的状态。因此,“隐”并非消极失败的同义语,反而是一种具备正功能的人生准则和价值取向,如澹泊名利、廉让不争、行己有耻等。

第一,“隐”的价值表征是轻忽禄位。

中国隐士的显著特征是不愿从政作官,所以有学者指出,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5]从《高士传》、二十五史等史籍中的隐士传记来看,隐士最为引人瞩目的行动特征是,他们面对唾手可得的做官机会总是坚决予以拒绝,史家常用的措辞是“连征不起”、“称病不赴”、“固辞不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词汇几乎出现在每一个隐士的人生履历中,而且他们常常不止一次拒绝来自政府高官甚至皇帝的任命。

历代王朝在察举或科举等正式的选官制度之外,还有一些辅助性方式作为补充,如征辟制度,为那些没能经由常规渠道进入官僚系统的精英人士提供绿色通道。征辟过程有的由高级官员实施,有的则由皇帝亲自操作。历朝政府征辟隐士,一般形式是官方派专使、备厚礼毕恭毕敬地上门诚邀。隐士被政府征辟,不仅意味着可以得到官贵的礼

遇,甚至是帝王的垂青,更为重要的是不必经过激烈竞争而可以快速得到做官的便捷机会。但是,大多数隐士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普通人梦寐以求的做官机会和恩宠荣耀,而心甘情愿地“隐”,用晋代隐士郭瑀的话说,此乃是“逃禄”(《晋书·隐逸传》)。因此,隐士轻忽禄位体现了澹泊名利的价值取向,其“隐”的品格节操由此可见一斑。

传统中国社会是官本位社会,官僚是最大的社会资源,官僚贵胄意味着声望、财富与权威,在社会等级序列中高高在上,是普通人汲汲企求的理想彼岸。即使是当今社会,权力之大小、官位之高低仍然是社会差别的重要标志,权力资源发挥的作用常常超过财产和收入。^[6]苏秦落魄潦倒时,至亲骨肉都不待理睬他。后来苏秦游说诸侯成功而飞黄腾达,父母兄嫂妻子的态度立即全面逆转。他衣锦还乡时,父母鼓乐喧天远迎三十里,妻子也变得低眉顺眼,而嫂子则伏地跪拜。苏秦问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由是大为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苏秦的人生感悟反映了一个冷酷的社会现实,以权势大小论成败,因金钱多寡定荣辱。对于千千万万企图跳跃龙门的士人来说,势位富贵的确是永恒的动力之源。一个人是否做官,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其人所能够享受社会资源的优劣多寡。因而,入仕为官是自古及今无数人朝思暮念的头等大事,只要有实力有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殚精竭虑谋求一官半职。元杂剧《马陵道》中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就是凭藉文武艺臣事王侯,以此换得一官半职光耀门庭。历代文人士子寒窗苦学的巨大动力,除了修齐治平的崇高抱负,恐怕也与为官作宰的期待不无关系。做官可获得巨大收益成为人生常识,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士人为之奋斗不已。

《梁书·处士传序》引《孟子》佚文曰:“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然而博取势位

名利的常情却并不能覆盖隐士，隐士颠覆了士人必然出仕为官的应然选择，体现出一种与常规社会行动悖反的另类价值取向。世人普遍对王侯官贵趋之若鹜，或争取成为王侯官贵，或以臣事王侯为幸事，而隐士却表现出了与之相反的价值取向——不事王侯，轻忽禄位。隐士主动放弃为官作宰，也就等于主动放弃权位和名利。因而，“隐”不只是一种人生存在状态，更主要是一种价值立场，即对于权位和名利的厌弃。

第二，“隐”的价值内涵是廉让不争。

《史记·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之人蜂合豕突熙熙攘攘，无非是为了“利”而东奔西颠南来北往。但是历代隐士却坚守不事王侯、轻忽禄位的价值立场，表现出迥异于浇薄世风的节操品性。与那些为了权位名利而奔竞钻营的人相比，隐士最突出的个性人格就是廉让不争。因此，无论是帝王的征辟诏书，还是官贵的举荐奏章，乃至史家的书写评判，无不将隐士尊为澹泊名利的道德模范，无不将隐士奉为“抑贪墨、止奔竞”的活教材。

梁武帝萧衍邀请隐士何胤出仕做官，据其在诏书中自陈，之所以征召何胤，一个重要原因是“世道浇暮，争诈繁起，改俗迁风，良有未易”，所以希望隐士们能够出山襄助，辅佐自己改造世道人心，共创美好生活（《梁书·处士传》）。北宋隐士魏野去世后，宋真宗下诏赠慰问以示恩宠，并特意说明旌赏恤赠隐士的根本用意，在于“所以褒逸民而厚风俗也”（《宋史·隐逸传》）。那么，何以褒扬隐士就能够再造淳朴风俗？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认识是，隐士与那些投机争利的蝇营狗苟之徒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操行贞洁，“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隋书·隐逸传序》）。隐士王弘之矢志不仕，于是有官员上书皇帝要求予以旌表，因为褒奖隐士则可以弘扬倡导“隐”，再加上隐士典范的示范效应，从而“以彰止逊之美，以祛动求之累”（《宋书·隐逸传》），带动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与风气转变。故《梁书·处士传赞》也说：“夫可以扬清激浊，

抑贪止竞，其惟隐者乎！”

为了表彰隐士廉让不争的高洁品行，历代政府都对隐士大加褒奖，除了不时赠送财货礼品，还一再征辟礼聘，邀请他们出来做官。然而充满悖论的是，隐士的身份亮点恰恰是拒绝做官、不受馈赠。隐士不仅坚决拒绝从政，而且对于官贵或政府的礼物馈赠同样常常“不受”、“一无所受”。隐士传记中诸如此类的记述层出不穷，在简洁的文字背后，蕴藏着比拒绝做官更为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与道德修养。中国隐士的人格很伟大，但生活却很卑微，他们可以不接受官职，却不能不营求衣食之资。许多隐士生活贫寒，但是他们却能够在饥寒交迫、等米下锅的紧要关头，义无反顾地拒不接受官贵或政府的馈赠。当然，有的隐士采取了相对灵活变通的方式，或者象征性地取用一点以示不拂人情，或者泰然接纳又转手送人。

隐士之所以如此决绝，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实质上是为了严格坚守内在的道德操行，即“隐”德。“隐”德的核心是“让”。晏子曰：“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左传》昭公十年）“让”是一种美德，礼让或谦让是人伦道德最具根本意义的价值品质，也最能反映一个人在名利地位方面的修持品性。伯夷与叔齐作为古代隐士的典范，其“隐”的价值内涵就建基于“让”。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夷、齐兄弟在继承王位一事上相互谦让，最终先后逃隐。在世俗价值评判中，王位极具吸引力，令古今无数英雄豪杰为之抛头颅、洒热血。正是由于王位具有绝对价值，向他人让渡则体现出超凡出尘的胸襟与气魄。夷、齐由于礼让王位而逃隐，由此树立起了“隐”的无上崇高性。普通人虽然不具备让渡王位的可能与条件，但是能够出让自己的“利”，同样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人格品质。隐士刘凝之在灾荒之年，将官贵所赠救急的十万钱抬到集市，“观有饥色者，悉分与之，俄顷立尽”（《宋书·隐逸传》）。自己面临着饥寒冻馁，却把别人雪中送炭的馈赠用以救助与自己毫无关联的其他灾民，这种行为不仅与人的天然本性对立，而且与生活中

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取向不同。

隐士既然能够将本已属于自己的利益主动让渡给予他人，那么意味着他们也能够对属于自己的利益不去纷争。隐士庾诜驾船运粮回家，共载米一百五十石，邻人托他帮忙捎带三十石。到家之后，邻人放赖，声称庾诜的米只有三十石，而自己是一百五十石。但庾诜并不争辩，任由邻人取足而去（《梁书·处士传》）。隐士的廉让不争虽然并不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但是他们能够牺牲一己之利益，作为升斗小民也确实难能可贵。因为生活中多见的正是蝇头小利的纷争纠葛，隐士廉让不争，在“小”处彰显出了“隐”之大义。

当然，廉让不争并不是任何情况下的必然选择，它特别强调的是面对“利”时的应然选择。如果面对的不是“利”而是“义”，则要求“不让”、要求“争”。孔子曾要求，“当仁不让”（《论语·卫灵公》）。许多隐士确实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委曲求全，而是勇于铁肩担道义。

第三，“隐”的价值保障是行己有耻。

隐士既不接受政府的任命，也不接受官贵的馈赠，在日常生活的利益纠葛中，又表现出廉让不争的高风亮节。不过，争名逐利是人的一种本能，生活的艰难、享乐的欲望，都会使人迷恋名利追逐势位。晏子曰：“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左传》昭公十年）“争”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其直接指向就是“利”。那么，隐士何以能够特立独行，做到澹泊名利、廉让不争？根本原因在于隐士知耻，行己有耻。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争名逐利被视作令人不齿的丑行与恶行。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对义与利的不同选择，显示了人品的高尚或者卑劣，人品高下立现。因此，与君子、小人的对垒一脉相承，自古及今的主流价值观都要求人们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而不是相反。荀子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说文解字》曰：“辱，耻也。”争名逐利而置道义于不顾就是“耻”，而且以利为耻

的观念深入人心流播久远。陈平分析楚汉形势时认为，刘邦能以名利拉拢人，于是“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史记·陈平世家》）。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指出，秦帝国施行刑名法术之学，结果文武百官“造伪饰诈，趣利无耻”（《汉书·董仲舒传》）。苏辙在一段讨论君子与小人关系的文字中说，“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所以总是小人胜而君子败（《宋史·苏辙传》）。嗜利无耻、趣利无耻、贪利忍耻等构词形式反映出，贪利、嗜利、趣利就是无耻，利与耻之间的对应关联从以上修辞中亦可见一斑。

耻，是一种引起愧疚和自责的心理体验，源于内化为价值自觉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压力和约束。孟子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羞恶之心，就是耻感。按照孟子的说法，知耻是人与生俱来的良善本性，如果无耻则不可称之为“人”。所以孟子多次强调，“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公孙丑》）。顾炎武也认为，有的人操行不洁，为人办事毫无人伦道德底线，“其原皆生于无耻也”，由此认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犹为要”（《日知录》卷 13《廉耻》）。汉朝种嵩重义轻财，将全部家财用以赈恤宗族及乡党之贫者，然而“其有进趣名利，皆不与交通”（《后汉书·种嵩传》）。种嵩之所以不屑与进趣名利之人交往，乃是以名利为耻也。而隐士以让利、不争利来经营其“隐”德，也正是由于以利为耻，尤其是以不当得利为耻。

史籍中关于隐士以利为耻多有颇为夸张离奇的记述。《庄子·让王》篇及皇甫谧《高士传》说，尧以王位礼让隐士许由，许由以听闻此类言语为耻，于是跑到河边洗耳；汤以王位礼让隐士卞随、务光，二人以被视为贪慕王位为羞，激于义愤跳河自杀。当然洗耳、投河只是寓言故事，意在塑造“隐”与“利”绝不相容的正当性。不过，日常生活中的凡俗之人都不能不言利，而大多数隐士亦是升斗小民，他们也必须营求生活之资。朱百年隐居山中，靠砍柴搂草过日子。与一般的山野樵夫不同，朱百

年并不亲自叫卖,而是将柴草放在路口,人们觉得奇怪,“积久方知是朱隐士所卖”(《宋书·隐逸传》),于是根据个人所需取走柴草并将钱留下。另一隐士朱桃榭卖草鞋也是如此卖法。据《新唐书·隐逸传》记载,朱桃榭将自己编织的草鞋放在道边,人们知道这是朱隐士在卖鞋,所以将茶米之属放下换走草鞋。等别人走开,朱桃榭则出来取走茶米。之所以采取一种买卖双方并不见面的交易方式,乃是隐士耻言利也,而世人能够理解隐士的良苦用心,故也乐于成全他们的操守。

隐士知耻,故能摆脱名缰利索而有所不为,陶渊明即是典范。朱熹评价陶渊明确说:“陶渊明确说尽万千言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大不能忘,他只是硬将这个抵拒将去。然使他做那世人之所为,他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贤于人也。”(《朱子语类》卷34《论语十六·述而篇·子谓颜渊曰章》)可谓诛心之论。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如此拿得起放不下,确实是不能忘怀贫贱富贵。现代学者也发现陶渊明清高之下隐藏着世俗性,如辞官归隐的矛盾心情、对贫穷的厌倦、对别人的施舍坦然接受、对死亡的恐惧、对身后名誉的热衷等,印证了朱熹“大不能忘”的评判。然而也正如朱熹所论,若使陶渊明随波逐流与世俯仰,他肯定是不干的,因为陶渊明“知耻”,有着超常的毅力能够将名利诱惑“抵拒将去”。在浔阳县令任上,陶渊明耻于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宋书·隐逸传》),于是毅然决然弃官归隐,从此终老田园。陶渊明不折腰即是行己有耻,不为“利”而失去傲骨。

陆九渊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陆九渊集》卷32)隐士行己有耻,所以能够不汲汲于名利,能够廉让不争,面对利益纠葛而甘心吃亏,能够无欲则刚,坚持气节而不致于斯文扫地。知耻,为隐士提供了一种价值选择的心理约束力量,确保他们澹泊名利、廉让不争,从而“隐”得彻底纯粹。于是,“隐”由身体行迹的藏匿与不显,转换为欲望诉求的收敛与离弃。故《魏书·逸士传序》曰,“隐”是“以恬淡为心,不嗷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

私”。正是由于恬淡无私、安时处顺,隐士在历朝历代都受到无限敬仰。

三

化解当前社会的结构性紧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良性运行,关键在于行动者的塑造。从十六大报告提出建构核心价值体系,到胡锦涛同志倡导“八荣八耻”,都在强调“人”的建设,即行动者在社会实践中必须具备正当的人生准则与价值取向。当代社会价值建构的目的,就是确立一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进行取舍选择的标准,确立行动者共同遵守的实践准则,本质上是使价值观念由混乱走向秩序化。

“隐”作为社会学视野中呈现的传统智慧和经验,当然能够成为当代社会价值建构的有益资源。中国隐士澹泊名利、轻忽禄位的行动表现,其内在的价值取向是廉让不争,即对名利和权位的厌弃;而隐士之所以厌弃名利和权位,乃是将中国文化中耻于争利的价值观念内化为行动自觉。所以,“隐”的核心是欲望诉求的收敛与离弃,是面对“利”而行己有耻、廉让不争。知耻、不争等价值修持,对于当代社会极化看待“利”和过分强调“争”,即致富、进取、成功、竞争等价值取向——具有救弊补偏、回归均衡的积极意义。

一阴一阳之谓“道”,张弛有度才能“和”,价值体系同样需要辩证均衡,如此才能使社会行动无过无不及。当前社会的主导价值,特别是生活化的价值实践太过偏重“利”和“争”,而缺乏避免“争利”走向极端化的缓冲中和维度。“隐”的价值内涵恰与“争利”相反,它要求澹泊名利、廉让不争、行己有耻,对为“利”而“争”的价值取向形成解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人们“争利”的无尽欲望。实际上,价值迷失并非真的失去了是非善恶的判定标尺和辨识能力,而是人们在利益和利害面前,经不住诱惑,经不起考验。只有外在的震慑与内在的修持双管齐下,才能使人们在利益和利害关头保

持清醒。因而,除了继续严肃党纪国法,还需找回失落的价值传统。“隐”对于当代社会核心价值建构的贡献与启示,不是在学者们众说纷纭的研究探索中增加一种新说法和新概念,而是使当代价值体系从整体上切实达成辩证均衡,从而有效安顿人们的焦灼心理,妥善安排人们的精神秩序,进而引导人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当前社会结构性紧张的化解步伐。

因此,“隐”不仅是传统社会中极为重要的价值维度,而且在当代社会仍然能够发挥积极价值调适功能。长时期以来,我们社会存在着诸多曲解“隐”的价值内涵的情形,有意无限放大“隐”之退让、不争的消极可能,而忽略了“隐”的积极功能。在当前的和平建设时期,尤其是为“利”而“争”的价值取向已经步入歧途并带来诸多副作用的形势下,必须重视发挥“隐”的积极功能。而且尤为重要,在当代社会价值建构中倡导“隐”,能够使人们在舍弃“利”的同时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满足,相对于生硬地要求人们澹泊名利、廉让不争的说教,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隐士在传统社会享有崇高的声望,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感召功能,所以其“隐”具有积极价值示范意义。人们尊仰“隐”、实践“隐”,意味着见贤思齐,意味着重义轻利,从而使澹泊名利、廉让不争、行己有耻等价值取向落在实处,有效达成善与美的价值诉求。

另外,社会学视野中的当代社会价值建构,不是传统思想观念在当代社会的简单复活与延伸,所以对“隐”的关照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既

要坚持“隐”的原生价值内涵,又要结合社会新形势与新要求,为“隐”注入时代的新内容。如当代社会舆论将生活中那些成绩斐然、默默奉献的人尊为隐士,既传承了传统“隐”之不争的精神内涵,又融入了现代社会的奉献、利他等价值元素。由此,过去不仅可以“活”在现代而形成传统,传统也可以在过去的框架内被“发明创造”出来,由此达成传统价值的当代传承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研究”(编号:10CSH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 [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1~34页。
- [2]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 [3]李汉林等:《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 [4]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915年第1期。
- [5]张立伟:《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页。
- [6]李强:《社会分层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 [7](日)冈村繁:《冈村繁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52页。

(责任编辑:羽林)